

目 录

我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一些回忆	何作霖 (1)
我曾参加过痛打卖国贼章宗祥	陈赞豪 (10)
我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	何 博 (14)
“五四”运动在广州	黄韶声 (17)
我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经历	郑彦范 (33)
我在非常国会提出查办魏邦平案	孔昭巖 (38)
“五四”运动在香港的回忆	陈 谦 (40)
“五四”运动在广东各地	郑 放 何凯治等 (46)
附录：广东督军莫荣新等镇压广东“五四”运动 的文电四件	(63)
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 的建立	谭天度 (66)
“五四”运动后广州青年学生的 一些革命活动	郭瘦真 (76)
“五四”运动后至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中 的左右派斗争	林增华 (82)

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青年组织“民权社”阮遂之（103）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宣传民主革命

之报刊高承元（111）

“五四”运动时期广州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

议和的经过黄光甫口述 江 莘 罗昌民整理（138）

“五四”运动后广州教会学校的反动措施

及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活动熊真沛（185）

十九路军史略（续上辑）陈燕茂 黄和春（191）

我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一些回忆

何 作 霖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现在已六十周年了。这个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自从这个运动发生以后，中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把当时在北京亲历的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过，概略地介绍如下，以供国人参考。

一、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

谈到“五四”运动，应该首先了解一下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因为“五四”运动是和北京大学有密切关系的。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后来改称北京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的翰林，曾留学德国。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当过教育总长。他是一个有开明思想的教育家、学者。学问道德很受人敬重。他办大学的宗旨，采取兼容并包主义。当时校内的教师分新旧两派。旧派即保守派的教师如刘师培、王国维、辜鸿铭等，出版的刊物有《国故》月刊。他们主张尊王、尊孔，主张忠、孝、廉、节等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旧文学，反对新文学，拥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新派即革命派的教师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树人）、钱玄同等，出版的杂志，有传播民主主义新

文化最有影响的《新青年》。他们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文言文，大胆提倡文学改革，主张白话文。《新青年》杂志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锋和旗帜。

当时最杰出的教授是李大钊先生。他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长，讲授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课程，是最早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和使中国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人，也是领导“五四”运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九月，毛泽东同志由湖南长沙来到北京时，由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到图书馆当一个职员（月薪八元），他除担任图书馆的工作外，经常和李大钊先生共同研究和讨论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计划。

当时我是北大预科哲学系的学生。曾亲自听过李大钊先生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受到很大的启发。那时校内学术思想的斗争和社会活动都很活跃。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和北洋军阀外交上的失败，促使全校学生一致奋起联络北京十四所大专学校学生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二、“五四”运动的实况

“五四”运动是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于山东、青岛等问题的要求失败而直接引起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所谓和平会议，目的在于分割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会议。我国

当时也是战胜国之一，当然也派了代表参加。我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以下七项条件：（1）列强放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2）撤退各国驻华军队；（3）撤消各国在华的邮政电报；（4）取消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主。留欧学生代表又添上了两项——收回山东和取消二十一条条件。会议对我国提出的要求全不理睬，还把德国在中国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五月一日，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后，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五月三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晚上，法科大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的大专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用血书写“还我青岛”四字，挂在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经手人）、章宗祥（驻日公使，是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陆宗輿（币制局总裁，是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并决定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后改北京师大）、工业专校、农业专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间学校的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齐集。北京大学队伍约在下午十二时半由文科红楼广场出发，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高

举着跟挽联一样的一副白布对联，上面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到达天安门时，那里的学生队伍已经停了好久，他们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帜和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当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他们见势不妙，只好低头溜走。

游行队伍看见军警撤走后，浩浩荡荡，一直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的坚强意志。队伍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前，看见有一个手拿木棍的巡捕，来回走动，但不许我们队伍通过。当时学生们大呼东交民巷虽然是使馆区，但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许我们队伍通过？大家非常气愤。后来队伍由东交民巷往左边一拐，到了东长安街，再穿过东单、东四，最后到了帽儿胡同赵家楼。游行队伍到了帽儿胡同曹汝霖住宅门前，看见宅前有一道围墙，高约三米，大门紧闭。群众大呼卖国贼，并用拳头砖块捶击大门，同时把旗子纷纷抛进墙内。但许久都不见开门。大家有气无处发泄，于是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面檐前的瓦片揭了下来，隔着临街的房屋抛进院里去，后来有人用力揭开窗口的铁丝网，钻进里面打开大门，大家蜂拥而入。但是进去之后，看不见一个人，于是学生们分开两路，一部分由右边从一个月洞门涌到一个象花园一样的院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一个花池。有一个日本人在园里踱来踱去，大家都不理睬他，以免惹起外交问题。后来又发现一个穿西服的人跟在那日本人的后面，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前拳足交加地把他痛打一顿，并捡起院里的砖头瓦片，向他乱砸，把他砸得

头脸出血，倒在地上。这时有人取下挂在客厅里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看，原来被打的不是曹汝霖而是章宗祥。在场的学生看见打死了章宗祥，于是纷纷散开走了。章宗祥后来被人送往同仁医院去。至于曹汝霖，则据说在混乱中由后窗向隔邻逃走了。当时我和另一部分学生由左边向曹汝霖的卧室和书房方面直进，忽然有一个身穿白色花衫的少妇，由里面仓皇逃出。自己说是曹汝霖的家人，名叫苏佩秋。我们立即把她释放了。我和其他学生，各人拿着木棍或椅子到处乱打乱砸，我也砸坏了一架大型钢琴和一些家具，并一直跑进曹汝霖的书房里，里面挂满了许多卖国政府各权贵的照片，都给我撕碎了。不久，书房后面起了火，我看见后面冒出一团白烟，究竟是谁点的火，没有弄清楚，于是各人纷纷散出。到了门外，看见许多武装警察沿途放哨站岗。我走了数十步，向左拐了弯，一直朝前走，途中经过一座警察派出所，门外站着几个武装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喝令“站住”，气势汹汹地把我抓住，并搜查我全身，最后把我两手往后反缚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捆起来。他不许我讲话，并由两名武装警察把我带走。当时大约是下午五、六时左右。沿途群众看见我这个样子，都敢怒不敢言。当我们走到东长安街时，有一个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的外国人坐着人力车经过，向我招手致意。我也向他点头作答。不料右边的那个警察举起手来向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后来，他们把我带到京师总警察厅里，当时看见里面已有二、三十个被捕的学生，等了许久，大约是下午七时左右，警官对被捕学生开始审问。警官问我受何人指使参加游行，为什么闯进曹公馆捣毁东西，打伤章公使，放火烧房屋？我回答说：“我们学生完全出于爱国心，一致起来反对卖国贼签订卖国条约，断送山东、青岛，并没有受任何人指使的”。警官无言以

对。审讯完毕，我们开始用膳。饭后，我们被送进一间大厅里，分别睡在三张特大的炕床上面。次日（五月五日）上午九时许，各学校教职员学生的代表和工商界的代表纷纷到来慰问，并传说政府将严惩学生，解散学校。当时各校校长和社会知名人士竭力营救。同时各校学生会亦纷纷向政府交涉，要求迅速释放被捕学生。

三、释放学生的经过

五月五日，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以同学因爱国之故，竟被拘留，群情异常愤激，相约一致罢课，并派代表联系北京市各工商业团体，及打电报给全国各省市，一致起来举行罢课、罢工、罢市，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取消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约，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打算严办被捕学生，后来知道北京十四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已全体罢课，并联系工商界罢市、罢工，同时各校校长和社会上知名人士极力取保，因恐把风潮闹大，于是令京师总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将被捕学生三十二人全部释放。五月七日上午十时，各校派汽车六辆赴警厅迎接被捕学生三十二人。当汽车到达北京大学时，路旁群众欢声雷动，学生们也鼓掌答谢，并不断高呼“还我青岛”等口号不止。学生返校时，校中全体学生在北大文科红楼广场排队欢迎，队伍前面，摆着几十张大方桌，以便各被捕学生站到桌上和全体欢迎群众见面。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和许德珩同学一齐站到桌上和群众见面。群众一齐鼓掌欢迎。我也招手答谢，禁不住悲喜交集，泪下如雨。悲的是我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所提出归还青岛权利等要求不被接纳，喜

的是得到严惩卖国贼的机会，泄了心中的愤恨。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释放后，悲惨弥漫的北京城，一时略见光明。五月八日，各校开始陆续上课。

四、蔡元培校长被迫辞职

五月九日，北京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五月四日行动的主使人。北大校长蔡元培自知政府有意撤换他，遂决定提出辞职，辞呈略谓：“元培滥膺校席以来，不称厥职，久图引退。此次大学校学生，因爱国之故，激而为骚扰之举动，元培实尸其咎。唯因当场学生被拘，不能归罪于少数，未即引咎。目下学生业经保释，各校已一律上课，元培不敢尸位，谨请辞职，以避贤路”等语。八日晚上，蔡氏得一紧急消息，遂于九日晨出京，不知去向，临行时留下一启事，略谓“吾（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愿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等语。蔡校长的出走，非常秘密，连最亲信的人也不知道。看他留下的启事，即可推知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最大的暗潮而被迫出走的。

此事发生之后，北京学界大为震动，各校约于十一日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同时又上呈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校长，惩办卖国贼。当时北京卖国政府为敷衍学生计，表面上同意挽留，实际上正在准备另行派人接替。各校学生知道政府毫无诚意，于是一面据理力争；一面组织十人团，分赴各地演讲，企图唤起群众，一致奋斗。六月三日，北京卖国政府大捕学生，于是更激起

蔓延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六三”群众运动。

五、“六三”以后运动的情况

北京“六三”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五四”运动好比星星之火，“六三”运动是燎原的烈火，蔓延到全中国。“五四”运动主要限于大多数知识青年，“六三”运动则发展到工商界和农民，可以说是伟大的全民性的爱国运动。

自从北京卖国政府采取敷衍学生的政策失败以后，于是一变而施行武力镇压政策。六月二日，政府发布两项命令，其一则偏袒曹、章、陆；其二则痛斥各校学生。当天上午就逮捕了学生七人。六月三日下午一时左右，我和北大学生约千余人齐集正阳门大街一带，沿途向各商店演讲日本阴谋霸占我山东青岛权利的经过，请大家一致起来反对；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曹、章、陆；要大家不买日货。同时向群众散发传单。不久，我看见一批拿枪的武装警察到来驱散群众，并劝我们不要演讲。我们没有停止，仍然继续演讲。警察于是逼近我们，想用武力把我们驱散。我们队伍也慢慢集合在一起站着不动。警察于是把我们包围起来，用好言相劝。过了好久，我们感到已无法讲演，于是逐渐向北移动。警察也跟着一直把我们带到天安门紫禁城内广场，想把我们拘禁在广场里面。我们进了广场后，大家散开列队站立，向警察演说当时国内外危急情况，希望大家加强爱国心，一致团结对外。各警察默然无言。那时大约是下午五时左右，我们要求派人回校搬运行李用具，准备在广场内住宿。过了一小时许，天色逐渐黑暗，警察们感到被拘学生太多，无法处理，于是一声令下，忽然由两个警察把一个学生推出天安门外。其中也有些学生因个子

大、声音响亮被继续拘留不放的。记得当时我的一位东莞同乡王荣佳，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被拘留不放。至于我本人则在这时被警察拖出天安门外。

自从六月三日军阀政府施行高压手段，下令禁止十人团学生出外演讲之后，连日大捕学生。六月三日，反动军警逮捕学生三百多人。北大法科和理科都被当作临时监狱。六月五日，全市又有五千多学生分为三个纵队到各处讲演，学生们都带备行李、用具，准备坐牢，弄到军警束手无策。各校学生因出外演讲被军警打伤的，日有数人，一律送往同仁医院治疗。各校学生因游行演讲而被拘留的，数在一千以上。拘留地点，除北大法科和理科外，尚有警察厅和步军统领衙门。

六月三日军阀政府大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浪潮，从广东到黑龙江，席卷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了政治性的大罢工；各省市的商人，也起来参加了大罢市。军阀政府在这种猛烈的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下，手足无措，不得不于六月九日批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辞职。

六月二十八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一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包围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签字。六月三日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伟大的工人阶级、爱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广大群众性革命运动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一九七九年三月稿

（省民革供稿）

我曾参加过痛打卖国贼章宗祥

陈赞豪遗稿

“五四”运动爆发之日，我身历其境，曾亲进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捣毁焚烧和动手打过卖国贼章宗祥。现把当时的经过情况今犹记忆的记述如次：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气候不寒不热，是日下午一时，北京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约五千余人（其中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齐到天安门广场集合，每人手执小旗，旗上写着：“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争回青岛”，“惩办亲日派曹、章、陆等卖国贼”，“抵制日本货”等标语。在开大会时，群情愤激，高呼口号，声震云霄，来往东西长安街的车辆暂停通过。旋即列队游行示威，北大学生排列前头，我排在最前的行列。游行路线原定经过东交民巷，到日本公使馆示威。但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时，反动军警在巷口守住，不得通过，遂沿旧户部街朝北行进，经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再向北行，转入赵家楼，到达卖国贼曹汝霖的宅门。这时曹宅大门紧闭，群众怒不可遏，一面高呼口号，一面纷用旗杆撞门，打破窗的玻璃，有些学生就地拾取砖石击破窗上玻璃而掷入屋内。前列队伍在宅门外约滞留了半小时，见无法打开大门，遂转向赵家楼东行，约数十步，后面的同学即大声叫喊：“有的同学已由击破的小窗口爬进屋内，把大

门打开了！”我们便回转跑步蜂拥冲进曹宅，一进大门即见有一些反动警察在屋内守卫，看见我们时，却合掌作揖，低声说道，“曹汝霖不在家，请大家回去吧”。当时怒气冲冲的学生不理睬他，立即分头在屋内各处搜索。忽见花园里有个穿燕尾礼服的人正仓皇跑过，我们便抬起砖块掷击他，击中他的额部。他抱头鼠窜，转眼不见了。这时曹汝霖的父亲正在客厅里挨墙站着，向我们打拱作揖，墙上挂着一面大镜架，我们掷石击中镜面，崩然破碎，玻璃片纷纷落在他的头上（有学生认得他是曹汝霖的父亲），他就慌忙跑了。曹的宠妾苏佩秋，原是八大胡同的名妓，她看到我们来势汹汹，吓得面无人色，也窜跑了。我们将曹宅内的古董字画都捣毁了，还把一些衣服被帐等物搬到花园里放火焚烧，熊熊火焰有延及房屋之势。宅内一些守卫警察，要打电话通知消防队，却被我们制止了。当时闯入曹宅的学生约有一百多人，经过横冲直撞约一小时，忽然听到赵家楼西口响起警哨，我们感到会有大批军警到来镇压，便招呼队伍从后门走出，通过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名称已忘记）。这时我和八九位同学由那条小胡同向北走，约跑了数十步，忽听得后边有位同学喊叫：“曹汝霖躲在本街一间卖烧饼的铺子里哪！”我们便跑向该铺去，到达该铺时，见铺门口有好几个反动警察守住，但拦阻不了我们，我们直冲而入铺内。入铺的同学约有十多人，果然发现一个穿燕尾礼服的人，横卧炕上，用手掩着面孔，额上用白手帕裹着，血迹浸透手帕，我们立即辨出他正是在曹宅花园里被我们用砖块击中额部的人，我们认为他就是曹汝霖。当时还有一个穿燕尾礼服的人坐在炕沿边上，侧身掩蔽着他，并向我们作揖，劝我们不要动手殴打。但我们不由分说，把那掩护的人揪开，他见势不妙，也就跑了。我们便向横卧炕上的人拳打脚踢，用竹杆木棒打他。从铺外又涌进

了一些同学进来，便将被打的人抬出去铺门口，放在地上，脚南头北卧着，同学们一齐动手，拳击脚踢，用竹杆木棒乱打。初时还见那人转侧回避手格和苦呻，渐至面色苍白，鼻孔流血，手脚伸直而闭目不动了，我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当时有一个西洋人坐着人力车经过，就下车向我们劝阻，我们同学却没有理睬他。但随后又听到响起了警哨，我们就警觉到那几个守门警察跑去拉队来了，于是同学们就沿着这条小胡同向北奔跑，各自取道回校去了。

当时参加打的同学不过二三十人，我们在回校的路上时，大家都说捱打的人，就算不是曹汝霖，也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我回到马神庙沙滩时，已暮色苍茫，万家灯火了。

当晚，我回到北大。原来北大学生会已贴出《报导消息》说：“章宗祥已被打死了”（其实被打受伤而没有死）。这时我才知道被我们打的是卖国贼章宗祥，不是曹汝霖。同时还知道有几十位同学被拘捕，禁押在户部街警察总监里。但我清楚知道被捕的同学，大半都没有进入曹宅，也没有打过章宗祥，因为冲进曹宅和殴打章宗祥的同学听到了警哨声，都从后门走出，向别条街道走开了。是晚八时，全体学生开会，还请校长蔡元培先生讲了话。我还记得蔡先生曾说过这些话：“……我决不辞职（因头一年，学生曾到伪总统府请过愿，因此蔡先生辞过职），对被捕的学生，我一定营救出来。并请各省同学向北大同乡会调查被捕同学人数姓名，马上去信安慰被捕同学的家长，请他们不要担心……”等语。

第二日，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组织讲演团，散传单，发通电。各人民团体都纷纷派代表，携带饼干、糖、果到伪警察总监慰问被捕的学生。在狱的同学一致表示：“如果不严办卖国贼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就决不出狱”。

在人民爱国的正义压力之下，到了五月七日，反动的北京政府就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用汽车分送释放的同学回到各校去。

一九七九、三、二八 恺整理

我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

何 博

一九一九年，我在北京大学法科学院法律系三年级肄业，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文书组里工作。

四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决定，同学们奔走相告，十分气愤。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几间大学的学生会秘密商议，发动集会游行，提出抗议。五月三日晚上，我参加了北京学生会的会议。会上宣布决定于五月四日举行北京学生集会游行。并议定一些具体工作，其中一项是写一批标语和传单。批驳“二十一条”这部份的标语和传单，指定由我起草，要求文字简短，措词有力。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即刻动手，一直写到天亮。

五月四日清晨，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先在北河沿法科学院集合，然后列队到天安门前。我负责分发标语和传单，所以游行时我在队伍的后端。我记得当时看到了“中国大学”、“北京法律学校”的旗帜。

游行队伍原拟通过使馆区东交民巷，但那儿不让我们通过，我们非常愤怒。有人提出：先找三个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问罪！于是队伍便绕道来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门前团团围着，“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连天价响。忽然，前头有人大喊：三个卖国贼都在里面。一部份学生就冲了进去。不久，

我看见了曹宅内冒出了浓烟。同时，大队武装军警来了。武装军警把学生包围着，我们和他们冲突，各校队伍都乱了，北大的同学也分散了，学生随即分头冲出去，反动军警也分头追赶和逮捕，我也被逮住了。

反动军警把逮捕了的学生分头押走。我们被逮捕的一堆约有数十人，我看见了北大同学谭鸣谦（即谭平山）、梁绍文、李居端、冯恕（四川人）。武装军警把我们押着走，一路走了大约五十分钟，到了西城陆军大学。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我们就被拘押在陆军大学里面。

原来反动政府早有布置，他们把陆军大学的课室，加了拦栅，改为临时“监仓”。但他们毕竟不敢对我们上镣和铐。不久，还端出饭菜来，摆了一桌一桌，劝我们“进餐”。

到了晚上，不少群众前来慰问，有的还送来了高级点心、水果、上好的汽水和香烟，堆的象个小山丘。直至深夜，还络绎不绝，使我们很感动。

在拘留室中，我们不断向监守军警质问、抗议，喊打喊杀之声，一直喧闹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传来了谣言，说“北大校长蔡元培已经辞职，不要以为他会保释学生”。可是到了下午，我们却悄悄地接到了一张条子，这条子就是我们的校长蔡元培亲笔写的，大家传阅看，我也看了两三回，他写着：“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亦欲小休矣。为君故，暂停。杀君马者，道旁儿……”（最后一句，忘记）。我们很激动，我们都很理解蔡元培先生是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的。

我们被无理拘押在陆军大学里过了两天，反动当局迫于舆论，就只有放人了。